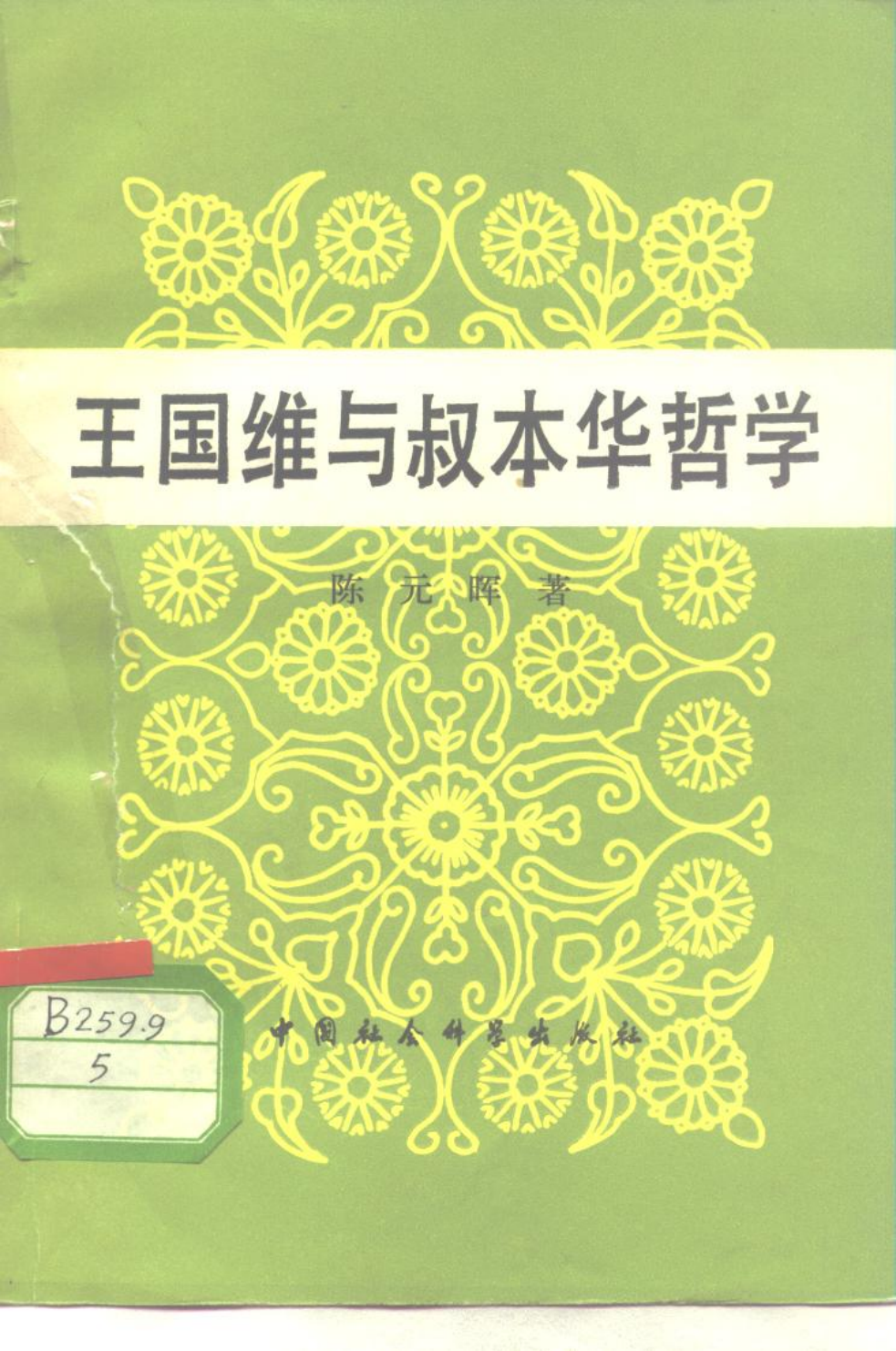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repeating yellow floral pattern. The pattern consists of stylized flowers with multiple petals and swirling vine-like lines connecting them. The top of the cover has a horizontal band with a larger, more detailed floral motif.

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

陈元晖 著

B259.9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

陈元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¼印张 66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册

统一书号：2190·028 定价：0.32元

目 录

王国维之死	1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6
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	12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27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42
王国维与海甫定的心理学	84
近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哲学	89
附：王国维哲学、美学著作年表	92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927年投昆明湖自尽，年仅五十。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在学术上却作出了很大贡献。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獬狁考》等是也”。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①其实，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不止于陈寅恪所说的“释证”、“补正”、“参证”三个方面，如诗词、小学、金石学、音韵学等，均有很高造就。对于填词，他则自认为：“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

^①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1934年6月8日陈寅恪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不及余之处。”^①王国维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他研究文字学、金石学、音韵学，也都是用它们来论证中国古代史。从甲骨文、钟鼎文、流沙坠简和敦煌写书中，寻求古代史资料，释证古代史实，他有所发见，有所创造，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开辟出一条科学途径。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可磨灭的。其次，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所写的诗，所填的词，所著的戏曲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都占有显著的地位。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美学论著。除史学和文学外，他又是早期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一位学者。他开始推崇康德哲学，以后服膺叔本华哲学，并以它为指导思想，贯串到《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及其他理论文章中去。陈寅恪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王国维所取的“外来之观念”，就是康德、叔本华等的观念，就是康德、叔本华等的哲学。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主要收集在他自己手定的《观堂集林》内，这部书共二十四卷，代表他的学术成就。但除此之外，尚有《观堂别集》、《观堂外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两周金石文韵读》、《史籀篇疏证》、《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流沙坠简考释》等著作及《观堂译稿》、《心理学概论》、《法学通论》等译著，两者合计六十二种。在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学术著作的丰富无出其右者。还有，他手校、手批的书籍，据他的学生赵万里统计，共一百九十二种，这都不包括在他著作和译著之内。这

① 《遗书》，1934年8月8日陈寅恪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5册，第21页。

些校批，对于整理古籍、校勘原本，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价值。以五十之年，作出如此成绩，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是罕见的。

王国维当鼎盛之年，自沉于昆明湖结束他的一生，这是中国近代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为什么一代学者竟沉湖自尽呢？陈寅恪认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①而梁启超则认为王国维的“自湛于渊”是由于“一朝嫉俗”，他挽王国维联是这样写的：“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鞫，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鸩维”^②陈寅恪和梁启超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是错误的，王国维是为封建王朝殉葬而死的。什么为理性而死，为行己有耻而死，都是为朋友文过饰非。他死之前，留给他的三子贞明的遗书，说明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③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快打到北平而北洋军阀即将全部崩溃的时刻，他认为要再受辱，所以自杀。他倒不是为北洋军阀殉葬，而是忠于清王朝，身殉于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成立民国，但溥仪仍保有紫禁城的小天地，在里面称帝称尊，王国维是这个小朝廷的五品官：“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命令鹿钟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王国维认为这是第一次受辱。当国民革命军进

① 《遗书》陈寅恪序。

② 《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第2页。

③ 同上书，第133页。

抵鲁豫时，他怕居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不得安宁，溥仪和王国维等臣子们再也不能称孤道寡、称臣打扞了。眼看要再受“辱”，所以以一死来避免，这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他死后，溥仪从天津下“诏书”，赐谥他为“忠愍”，也承认王国维是为忠心于清代末帝而死的。封建的三纲五常，影响王国维的思想至深至大，促成他的自杀，但这只是他的自杀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陈寅恪所提到的“外来的观念”，这“外来的观念”，在形成王国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起了同样巨大的作用。陈寅恪分析王国维的死因说是由超越时间、地域的“理性”所促成，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什么，未说出来。这种“理性”就是西方的先验论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哲学，使王国维深受悲观主义之害，使他走上自杀的道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最崇拜叔本华其人、其哲学的，就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固定，叔本华哲学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分析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王国维的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学者的一生影响是如何巨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使一代学者沉沦于痛苦的境界，竟至毁灭自己以求解脱，这是王国维之死的思想原因。

王国维从西方思想中汲取了科学方法，使他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但也是从西方思想中汲取一股毒液，促使他以五十壮年，自杀而死。这是矛盾，但又是事实。所以，只从王国维的成就方面看王国维，是不全面的；只认他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不全面的，他的哲学家身份也不能忽视。王国维的哲学家身份和他

的哲学思想，是了解王国维全貌的重要部分，也是关键部分，并由此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学者，都一定受一种哲学思想支配，——好的或者坏的哲学思想支配。王国维这位中国近代学者，就是受坏的哲学支配的典型人物。“青史已书殷鉴在”，写《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这本小册子，也就是作为一种“殷鉴”，使我们加深认识世界观对学术工作者的生活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使我们加深认识哲学与历史学、文学及其他学术门类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王国维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时候，是立志要做哲学家，并不是想做文学家或历史学家。他在旧中国，是最早与康德哲学接触的人物之一。他在《三十自序》一文中，叙述他与康德、叔本华哲学接触的经过甚详。1898年，他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东文学社学习，教师是日本的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是研究哲学的，是王国维学哲学的启蒙师。他看到田冈先生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段落，这是他知道康德、叔本华这两位德国哲学家的开始。1900年，他毕业于东文学社。第二年到日本东京求学，这时他白天学英文，晚间到物理学校学数学。1902年夏，因病回国。从这时起，他决心从事哲学研究。《三十自序》中说：“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①王国维开始接触哲学，是由于“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他想从哲学中找出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但他从康德找到叔本华，找到这位悲观主义的大师，却为他自己找到了一条死路。

^① 《遗书》第15册，第20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国维为他的《静庵文集》写的一篇《自序》，其中也谈到他研究哲学的经过。他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①。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今译康德）之《纯粹批评》（今译《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可解，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意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而上窥。……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②王国维在1903年开始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读到该书第二部第一编《先验分析论》时，差不多全部都不能理解，因此，停止不读。1905年，他在苏州师范学校教书时，重读康德的书，并决心在以后数年专力研究康德哲学，这时，他觉得不象前年那样读不懂，因此除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以外，兼读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著作。他在《三十自序》中曾这样写道：“次年（1903年），始读汗德之《纯粹批评》，至《先天分析论》（今译《先验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③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④及其文集等，尤以

① 光绪辛丑、壬寅之间，即1901—1902年之间。

② 《遗书》第14册，自序第1页。

③ 《意志及表象之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今译为《世界是意志和表象》。

④ 《充足理由之原则论》（Ü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 1813）、《自然中之意志论》（Ü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 1836），今译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论自然中的意志》。

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者也。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者也。”^①王国维从1903年到1907年，对康德哲学进行了五年四次的研究，并自己认为弄通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的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他从事于学术活动的开始，是对西方哲学有兴趣，特别是崇拜康德这位德国先验论哲学家。他写了一篇《汗德像赞》，全文如下：

人之最灵，厥维天官。外以接物，内用反观。小知间间，敝帚是享。群言淆乱，孰正其枉。大疑潭潭，是粪是除。中道而反，丧其故居。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匪言之艰，证之维艰。云霾解驳，秋山嶢嶢，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藪。万岁千岁，公名不朽。^②

由于对康德的崇拜，又由于康德的哲学著作晦涩难懂，使他转向于叔本华，向叔本华求援，这就使他坠入唯意志

① 《遗书》第15册，第20页。

② 《遗书》第15册，第22页。

论、悲观主义的深渊；使他自沉于渊，结束他暂短的有为的年华。在他的哲学研究的生涯中，从康德转向叔本华的时候，他仍然是尊敬康德，仍然是一位中国早期的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就是一个自认为康德嫡传的弟子，也确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所以，王国维虽然已转向叔本华，但康德哲学思想在他的思想中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基本的。他和叔本华同属于康德主义的哲学营垒。叔本华承认康德的学说，但他认为康德的物自体是可知的，是人的意志。他从康德主义的阵营中独立出来，成为唯意志论的一个流派，王国维是跟着他走到唯意志论的营垒中去的。

当王国维在叔本华哲学著作中得到开通康德哲学的锁钥后，于1907年对康德再作第四次的研究，他发见康德哲学有“不可恃处”。他对康德哲学，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爱真理与爱谬误同时存在，这又是一个矛盾，但又确是真话。正由于存在着这一矛盾，使王国维不得不“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他在《三十自序》中曾这样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

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①

这一段自序中，“伟大之形而上学”，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叔本华的认识论；“高严之伦理学”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及叔本华的伦理学；“纯粹之美学”，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及叔本华的美学，这些著作，都是王国维所“酷嗜”的，他认为都是可爱的。但其中有“不可恃处”，有不可信处，有谬误，而可信的实证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可信而又不可爱。如何摆脱这种矛盾呢？就只有弃哲学而不去研究它们，来摆脱这种矛盾。

他在《三十自序》中又说：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非~~以学问，~~非~~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史则~~不喜~~，为哲学史家则又不愿，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① 《遗书》第1册，第21页。

② 同上书，其中“为哲学史则又不喜”句，据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改为“为哲学史家则又不愿”。

王国维弃哲学而从事于文学、考古学，情绪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觉得先验论哲学与实证论哲学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是可爱而不可信，一个是可信而不可爱，求可爱而又可信的哲学是不可能的，矛盾心理使他对哲学绝望。另一方面，他觉得哲学海洋，深不可测，而自己又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这使他决心转向文学了。三十岁是他的一生历史中的分水岭：三十岁之前，他立志要做一个哲学家，做一个康德主义者，做一个叔本华的同道，写《汗德像赞》，写《叔本华与尼采》，写《书叔本华遗传说后》等等文章，三十岁之后，就与哲学分手，1908年他三十一岁时，草《曲录》初稿成，1910年撰《人间词话》成书，1912年著《宋元戏曲史》，收集在《观堂集林》中的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等名著，也都是在三十岁以后写成的。他的《三十自序》是与哲学诀别的“诀别书”，对他自己思想的转变，和盘托出，使人一目了然。

王国维与哲学的接触，始于康德，终于康德。他开始惊叹“伟大之形而上学”，继则觉其“不可恃”，“不可信”，终至与康德断绝关系。但即使当他决心与哲学诀别转向文学时，康德主义仍对他有影响，特别是康德主义者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理论，他终身服膺，从未疏远，最后到他自杀，证明他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受害者。

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三大成就之一是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得到的收获。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外来之观念”，王国维不仅用它来评论《红楼梦》和考察宋元戏曲史，收获最大的还是在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所作的考证古史和古文字的工作。“取外来之观念”而产生出象《红楼梦评论》这样作品，却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失败。王国维也是一位中国早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术界重要人物。他向西方寻求到的“真理”，并不属于他早期所努力追求的康德主义或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渣滓，而是一种对于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和古文字很有用处的科学方法。他在1916年所写的《毛公鼎考释序》中说：“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论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

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状况；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亦庶乎其近之矣。”^①这是王国维用科学方法治文字学的自述。王国维采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使他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超过他的前代学者和同时代学者。

王国维认为西方学者，长于抽象，精于分类，善用综合、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都应该应用到各种学术研究中去。他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就是使用这些方法。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不是就字论字，就字识字，不能用猜测，不能用设想，而是要：第一，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况；第二，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第三，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第四，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这就看出，他是如何善用科学的方法以进行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分析之，归纳之，综合之，演绎之，反复论证，使他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为中国古文字学开创出一个新时代。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对于抽象、分类、综合、分析之为用，曾有这样的议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

① 《遗书》第3册，《观堂集解》卷六，第16页。